

“目光下移”构建有血有肉的“大历史”

——读《清朝大历史》

万桐

历史应该是立体的、多维的，只关注上层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精英社会的研究范式已经被很多学者所诟病。《清朝大历史》在“大历史”的写作手法之下，特别突出了下层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让人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近，近到事关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同时，也让人产生一种敬畏感，原来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历史研究要关注到国家管理与民生

谈到“大历史”的问题，不禁让人联想到赵世瑜教授在《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一书中所谈到的：“以往我们的传统史学对大历史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但问题出在人们用某种绝对化的、单一化的宏大叙事模式去研究这些问题，抽去了这个‘大历史’的生活基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把这个生活基础还给‘大历史’，这个生活基础就是我们所谓的‘小历史’。”这里的“小历史”指的是局部的历史、常态的历史，自然包括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史。赵教授呼吁将“小历史”还给“大历史”，提醒了我们日常生活史对于整体史研究的必要性，《清朝大历史》一书则做了一次很好的示范。作者在“后记”中说道：“‘大历史’，一个响亮的名字，令人联想到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中国大历史》。黄先生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中国大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作者认为黄仁宇先生所言的“大历史”主要是专注于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而《清朝大历史》立意国家认同，关注国家管理与民生问题，这也是该书称为“大历史”的关键点所在。

《清朝大历史》之谓“大历史”有三“大”：

第一，视野大。传统上所说的“大历史”观，主要指的是秉持一种整体化的文明思维与历史意识，在回顾往昔、直面现在、开创未来的维度上，在立足中国、环顾世界、纵贯古今的视野中，考察关乎国家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清朝大历史》在谈论到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传统的研究领域的同时，更是将目光转移到了基层社会，使得研究的视野进一

步扩大，由此也更能让读者窥探到清朝历史的全貌。作者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描述所占的比例并不小。在第十章《宗族、保甲、乡约与基层社会的新建构》中，探讨了宗族制度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以及保甲、乡约引发的基层社会多方面的变化；在第十一章《清中叶山西的日常生活》和第十二章《清中叶江西的日常生活》中，作者深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尽可能地还原了当时这两个地区人们的生活面貌和生活习惯。不仅如此，第十三章《宗教政策与民间信仰》中对于清代的民间信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如民间的鬼神信仰就表现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在第十五章《宫墙内外的演戏与京剧的形成》中，我们不仅能看到清朝时期中国的戏剧文化，也能看到戏剧与人们娱乐生活的联系性。

第二，叙事大。作者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叙述十分细致、全面，且视角独特。作者分析了山西、江西地区人们的婚姻与家庭，对于早婚问题、再婚问题、生育状况、婚后生育子女的情况、过继问题、父母赡养问题等各个方面都做了细致的介绍。同时通过对于山西人经营店铺的考察，介绍了山西地区人们的衣食住行；通过描述江西人从事农、工、商等多种经营，介绍了其日常生计。作者有两处描写视角独特，也十分生动有趣。通过列举大量的因吵架骂人而引发的刑事案件，介绍了其中所映射的山西地区人们的生活特性与价值观念。在描述江西人的生产生活时，作者将其与生态环境结合在了一起，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们的生活得益于丰厚的自然资源，但同时却也因为自然资源的争夺引发了矛盾和纠纷。可以说，作者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描写，绝不是简单的泛泛而谈，而是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普通百姓生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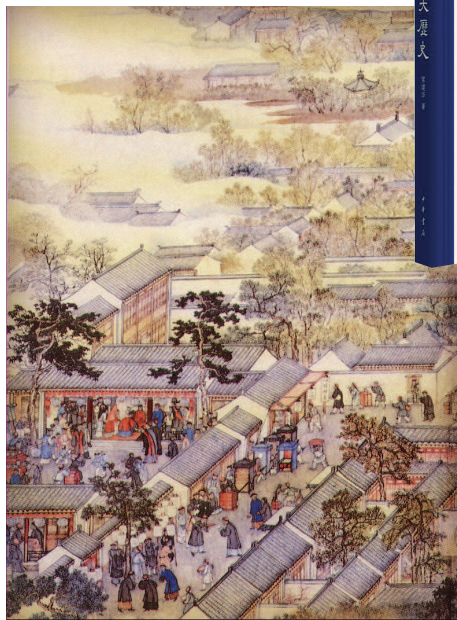
第三，史料大。正是由于作者的目光不是一直向上，所以在史料的选择运用上，与其他介绍清朝历史的著述也有一些区别，其使用的史料范围更加

全面、宽泛。除了实录、起居注、正史等资料外，作者对于档案资料、文人笔记、地方志、碑刻资料等的使用也驾轻就熟，特别是对于清代刑科题本的使用，构建了普通人的集体群像和生活状态。

综合以上，我认同作者所秉持的“大历史”观，历史研究要关注到国家管理与民生。历史终究是“人”的历史，在对宏大叙事的反思与批判中，历史研究应当将目光投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不断从具体而微观的视角重新审视和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样才能构建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历史”。

处理好“向上”与“向下”的关系

“目光下移”绝不是说历史研究者的目光只应该盯着下层群众看，相比于只关注上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研究者更应该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因为其生活也是历史的侧面反映。学者连玲玲在《典范抑或危机：“日常生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应用及其问题》中指出：“如果日常生活研究只专注于描写中下阶层的生活细节，殊难超越原有的研究框架，形成一个新的典范……它使研究者的眼光日益狭窄，不厌其烦地详细叙述各种琐碎事物，却不能从中说明其历史意义，历史学家的工作只剩下在旧报纸杂志堆里寻找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再将其拼凑成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史。”对此观点我十分认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不应该是孤芳自赏，画地为牢，它必须要打破一种束缚，找到与传统史学的联系。传统史学研究更为注重宏大历史进程、重大事件，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肯定无法替代传统史学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史研究和传统史学研究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沟通的桥梁。所以，历史研究者在目光下移关注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不能忘记目光也要“向上”，要清楚日常生活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不是互相隔离的，要努力建立起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时代的历史背景之间的关联，这样的日



《清朝大历史》
常建华著
中华书局出版

（清）徐扬绘
《姑苏繁华图卷·拜堂》

常生活史研究才有意义。

本书作者在写作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在谈到清代的佛教信仰深入民间的时候，不仅考虑到群众的心理，更是从大的方面，即国家的宗教政策角度去阐释。虽然从顺治朝到乾隆朝，僧道整体上受到了压抑，但是乾隆帝“还认为僧道已经成为清代民众谋生的手段，尽驱还俗将造成失业无依的社会问题，难以尽遣为民”，所以佛教信仰在民间并没有因为限制僧道而消失，它成为了人们民俗生活的一部分。再比如，谈到民间的演戏活动，作者介绍了清朝对于演戏活动做出的限制和规定，清朝在戏曲的内容、演戏的时间、观戏的人群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自然反映在了人们日常看戏活动的过程当中，人们看到的多是表现爱情、家庭生活的文戏，丧期和斋戒期不能看戏，有些地方规定妇女不得入场看戏……这些就是国家的政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刻下的烙印。

总的来说，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应该注意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互动，不能将其割裂开来。要把基层社会的研究对象融入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中，否则其研究意义便值得商榷。

“史海”中寻觅“人”的踪影

在介绍清中叶山西的日常生活时，作者开篇就说“历史文献往往缺乏普通人的资料”。的确，特别是有关普通人的社会史、生活史的史料更为零散，搜集起来需要耗费极大的时间和精力。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大大拓宽了史料的范围，地方志及

政府公文档案、文人笔记、民间契约文书、碑刻等资料也日益纳入日常生活史研究者的视野，这里要特别提到常建华教授近年来利用较多的清朝刑科题本。目前可以使用到的刑科题本资料集有：《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常建华教授除了利用清代刑科题本研究了清中叶山西、江西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外，还利用它研究过清中叶东北奉天地区的移民与日常生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联、各地方的社会职役等问题。在谈论到清代刑科题本的史料价值时，他认为：“清代刑科题本中的供词记载了事主的生命史资料与亲属关系，还有案件发生的场景，有意无意留下了时空、社会、生态的记载。”所以说，清代刑科题本是研究清代日常生活史的重要史料来源。

史料的多元化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庞杂的史料进行整合，并以新的视角和理念来解读，这点十分重要。就有关清中叶山西、江西的人口、婚姻、家庭的分析来说，作者对于史料的研读分析能力以及思考问题的角度令人叹服。《清代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中的档案资料记录了案件事主所交代的家庭亲属年龄及基本情况，作者仔细统计了事主父母长辈的年龄，发现清中叶山西、江西女性活到六七十岁是普遍现象，与我们习惯的认知“古人寿短”是不一样的，这点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对于零散史料的细致整理与分析，带着问题意识去思考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这是研究者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